

读人记

当代篇

读人丛书

韩小蕙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HINA

读人丛书

名／家／读／名／人

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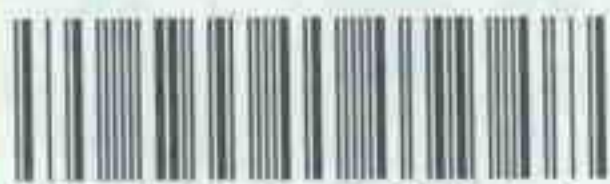
CHINA

2001
K812
332
2:1

读人记

当代篇

韩小蕙 主编



3 0591 3179 1

文化艺术出版社

目 录

第一辑

- 回忆汤用彤先生 季羨林(2)
- 寄冰心大姐 黄宗江(10)
- “若即若离”“我行我素” 林斤澜(16)
- 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
- 读徐迟(外一篇) 何 为(26)
- 一代儒僧李叔同 来斯夏(30)
- 漫说老聂 牛 汉(35)
- 聂绀弩
- 萧军风貌 许觉民(39)
- 文夫与茶 李国文(42)
- 沙蒙在1960年寒冷的早春 叶 楠(46)
- 好一尊“笑佛”林斤澜 柳 萌(54)
- 回忆陈翔鹤 林 非(58)
- 忍者秋耘 阎 纲(70)
- 夏衍的魅力 王 蒙(74)
- 蹲在电话里的维熙 冯骥才(80)
- 登山何必非极顶 刘心武(84)
- 严文井
- 孙犁印象记 谢大光(87)

- 为谁风露立中宵·····张抗抗(97)
——宗璞小记
- 初识平凹·····马治权(100)
- 他与地坛·····赵 玫(103)
——史铁生
- 与铁凝·····张立勤(106)
- 安于回忆·····张 炜(110)
——记王安忆
- 心中的先生·····王彬彬(116)
——纪念鲁迅辞世 60 周年
- 一脉清流消逝·····迟子建(121)
——读朱湘
- 愁如大海酒边生·····伍立杨(125)
——作为旧体诗人的郁达夫
- 云水生涯·····王开林(140)
——读沈从文
- 致张洁·····徐 坤(152)
——恨比爱更长久

第二辑

- 我眼中的张中行·····季羨林(158)
- 送指路人邓广铭·····金克木(164)
- 智慧老人刘顺元·····艾 煊(170)
- 说熊秉明·····吴冠中(176)
- 张东荪其人其学·····来新夏(182)
- 一个钟情的人·····牛 汉(188)
——曹卓和他的诗
- 怀念书友家英·····范 用(195)
- 绀弩大兄·····许觉民(200)

大冯印象	李国文(204)
荒煤,我心中的丰碑	林 非(208)
在朗润园静静的一隅	谢 冕(216)
——记陈贻焯先生	
“娜拉走后怎样?”	阎 纲(221)
——读顾准	
真情 真思 真美	乐黛云(230)
——我爱读季羨林先生的散文	
灵前的忏悔	宁宗一(237)
——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读李锐	邵燕祥(244)
难忘冯牧	王 蒙(248)
王子的舞步	刘心武(252)
——林斤澜	
夕阳下的王瑶先生	王得后(255)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韦 柰(264)
关于日记与灵魂的失落	张曼菱(275)
——涉及《吴宓日记》兼评某文	
给李国文“相面”	韩小蕙(284)
苍凉的手势	丁亚平(299)
——电影史上的“桑张对”	
钱玄同与周作人	孙 郁(304)
找一片天空自由呼吸	李 辉(308)
——怀念董乐山先生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大学观念	王彬彬(316)
拗书生	伍立杨(321)
——陈独秀	
“红真,今晚出去喝一杯”	徐 坤(324)
落日故人情	周晓枫(329)
——袁苇岸	

第三辑

- 一颗小行星 艾 焱(338)
——张钰哲
- 吴大羽:被遗忘,被发明的星 吴冠中(342)
- 清风亭下哭信芳 黄宗江(347)
——周信芳大师九十诞辰祭
- 送董竹君远行 范 用(355)
- 太阳岛上滞留着诗魂 叶 楠(359)
——悼乌·白辛
- 身后不寂寞 柳 萌(364)
——怀念著名表演艺术家金乃千
- 跨过那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368)
——史家胡同我们的家
- 知遇者说 郭启宏(382)
——于是之
- 在弄云师门外 王得后(385)
- 王瑶先生杂忆 赵 园(396)
- 延眺属清秋 张抗抗(404)
——记延泽民
- 为献身者献身的女性 张曼菱(418)
——读许广平
- 追求人性的解放 王英琦(422)
——为李小龙诞辰 60 周年而作
- 花开花落浑闲事 陈平原(429)
——怀念黄海章先生
- 以学为乐 以史为志 夏晓虹(437)
——季镇淮教授印象

- 解读梁晓声 韩小葱(445)
- 一个人,一首长诗 张 炜(460)
- 读鲁迅
- 人在故事中行走 李 辉(465)
- 记黄永玉
- 一半在凡尘 一半在仙界 楚 楚(470)
- “这一个”装帧艺术家张守义
- 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 何向阳(479)
- 读林徽因

CHINA

第一輯



回忆汤用彤先生

季羨林

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过去八十多年的记忆，如云如烟，浩渺一片。但在茫茫的烟雾中，却有几年闪光之点，宛如夏夜的晴空，群星上千上万，其中有大星数颗，熠熠闪光，明亮璀璨。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晶莹如在眼前。

我对于汤用彤先生的回忆就是最闪光之点。

但是，有人会提出疑问了：“你写了那么多对师友的回忆文章，为什么单单对于你回忆中最亮之点的汤锡予（先生的号）先生却没有写全面的回忆文章呢？”这问得正确，问得有理。但是，我却有自己的至今还没有说出来过的说法。试想：锡予先生是在哪一年逝世的？是在1964年。一想到这个年份，事情就很清楚了。在那时候，阶级斗争已经快发展到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程度。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还没有爆发，但是对政治稍有敏感的人，都会已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高压气氛。锡予先生和我们都属于后来在十年浩劫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号的人物。我若一写悼念文章，必然会流露出我的真情

来。如果我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没有真感情,我不写回忆文章。但是,在那个时代,真感情都会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而一旦成了“小资产阶级”,则距离“修正主义”只差毫厘了。我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就把对锡予先生怀念感激之情,深深地埋在我的心灵深处。到了今天,环境气氛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能够把真情实感从心中移到纸上来来了。

因为不在一个学校,我没有能成为锡予先生的授业弟子。但是,他的文章我是读过的,他的道德我是听说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早已是我崇拜的对象。我也崇拜一些别的大师,读其书未见其人者屡见不鲜。但我却独独对锡予先生常有幻像:我想象他是一个瘦削慈祥的老人,有五绺白须,飘拂胸前。对于别的大师,没见面过的大师,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幻像,此理我至今不解。但是,我相信,其中必有原因,一种深奥难言的原因。既然“难言”,现在就先不“言”吧。

1945年,我在德国呆了整整10年之后,二战结束,时来入梦的祖国母亲在召唤我了。我必须回国了。回国后,必须找一个职业,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抢一只饭碗”。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没有饭碗,怎么能过日子呢?于是我就写信给我的恩师、正在英国治疗目疾的陈寅恪先生,向他报告我10年来学习的过程。我的师祖吕德斯(Helmut Lüders)正是他的老师,而我的德国恩师瓦尔特施密特(Emstwaldschmidt)正是他的同学。因此,我一讲学习情况,他大概立即了然。不久我就收到他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一些奖掖鼓励的话以外,他说,他想介绍我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实在是望外之喜。北大这个全国最高学府,与我本有一段因缘,1930年我曾考取北大,因梦想出国,弃北大而就清华。现在我的出国梦已经实现了,阴阳往复,往往非人力所能定,我终究又要回到北大来了。我简直狂喜不能自己,立即回信应允。这就是我来北大的最初因缘。

1945年10月,我离开住了10年的“客树回望成故乡”的哥廷根,挥泪辞别了像老母一般的女房东,到了瑞士,在这山青水绿的世界公园中住了将近半年,然后经法国马赛、越南西贡、英国占领的香港,回到了祖国的上海。路上用了将近4个月。时二战中遗留在大洋里的水雷尚

未打捞，时时有触雷的危险。载着上千法国兵的英国巨轮的船长，随时都如临深履薄，战战兢兢，终于靠他们那一位上帝的保佑，度过了险境，安然抵达西贡。从西贡至香港，海上又遇到飓风，一昼夜，小轮未能前进一寸。这个险境也终于度过了。离开祖国将近 11 年的儿子又回到母亲怀抱里来了，临登岸时，我思绪万端，悲喜交集，此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初到上海，人地生疏，我仿佛变成了瑞普·凡·戴克(Ritvan Winkel)，满目茫然。幸而臧克家正住在那里，我在他家的塌塌米上睡了十几天。又转到南京，仍然是无家可归，在李长之的办公桌睡了一个夏天。当时寅恪师已经从英国回国，我曾到他借住的俞大维的官邸中去谒见他。师生别离已经十多年了。各自谈了别后的情况，都有九死一生之感。杜甫诗说：“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不啻为我当时的心情写照也。寅恪师命我持在德国发表的论文，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去见当时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时校长胡适尚留美未返。傅告诉我，按照北大的规定，在国外拿了学位回国的人，只能给予副教授的职称。我对此并不在意，能入北大，已如登龙门了，焉敢还有什么痴心妄想？如果真有的话，那不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了吗？

在南京做了一个夏天的“流动人口”。虽然饱赏了台城古柳的清碧，玄武湖旖旎的风光，却也患上了在南京享有盛名的疟疾，颇受了点苦头。在那年的秋天，我从上海乘海轮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到了北平。锡予先生让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迎接我们。时届深秋，白露已降，“凄清弥

天地，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我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凄凉中有欣慰，悲愁中有兴奋，既忆以往，又盼来者，茫然懵然，住进了几乎是空无一人的红楼。

第二天，少曾（阴法鲁号）陪我到设在北楼的文学院院长办公室去谒见锡予先生，他是文学院院长。这是我景慕多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先生。把眼前的锡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锡予先生一对比，当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却更爱眼前的锡予先生。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而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晚上，先生设家宴为我接风，师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当时一介和一玄都还年小，恐怕已经记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从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开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

我可绝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来星期，至多不过 10 天，锡予先生忽然告诉我：我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前两者我已经不敢当，后者人数极少，皆为饱学宿儒，我一个三十多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竟也滥竽其间，我既感光荣，又感惶恐不安。这是谁的力量呢？我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个人，这都出于锡予先生的垂青与提携，说既感且愧，实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我做副教授任期之短，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北大的新记录，后来也恐怕没有人打破的。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恩情，它对我从那以后一直到今 50 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中，起了而且还在起着激励的作用。

但是，我心中总还有一点遗憾之处：我没有能成为锡予先生的授业弟子。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大概是 1947 年，锡予先生开“魏晋玄学”这一门课，课堂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上。这真是天赐良机，我焉能放过！解放前的教授，相对来讲社会地位高，工资收入丰，存在决定意识，这样就“决定”出来了“教授架子”。架子人人皆有，各有巧妙不同，没有架子的也得学着端起一副拒人的架子。我自认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有没

有架子，我自己不得而知。但是，在锡予先生跟前，宛如小丘之仰望泰岳，架子何从端起！而且听先生讲课，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当时，一位教授听另外一位教授讲课，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这些事情我都不想，毅然征得了锡予先生的同意，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一整年没有缺过一次课，而且每堂课都工整地做听课的笔记，巨细不遗。这一大本笔记，我至今尚保存着，只是“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了，有朝一日总会重见天日的。这样一来，我就自认为是锡予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了一个宿愿。

锡予先生对我的关心是多方面的，他让我从红楼搬到文科研究所的大院子里去住，此地明朝是令人闻而股悚的特务机关东厂，是专杀好人折磨好人的地狱，据说当年的水牢还有遗迹保留着。“庭院深深深几许”，我住在最里面一个院子里，里面堆满考古挖掘出土的汉代砖棺，阴气森森，传说是闹鬼的凶宅之一。晚上没有人敢来找我，除非他在门房打听得万分清楚：季羨林确是在家里，才敢迈步走进。我也并非“季大胆”，只是在欧洲十多年，受了“西化”，成了一个“无鬼论”者，所以能处之泰然。夏夜昏黑，我经常在缕缕的马樱花香中，怡然入梦。

当时的北大真正是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胡适之先生，还经常不在学校，并没有什么副校长。一个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一个秘书长主管全校的后勤工作。6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各设院长一人。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校院长联席会，什么系主任联系会。专就文学院而论，锡予先生孤身一人，聘人、升职等等现在非

开上无数次会不可解决的问题,那时一次会也不开,锡予先生一个人说了算。大概因为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娄子。我们系里遇到麻烦,我总去找锡予先生,他不动声色,帮我解除了困难。他还帮我在学校图书馆中要了一间教授研究室,所有我要用的书都从书库中提到我的研究室里,又派一位研究生马理女士当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室内窗明几净,我心旷神怡。我之所以能写出几篇颇有点新见解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出于锡予先生之赐。我的文章写出后,首先送给锡予先生,请求指正。他的意见,哪怕是片言只语,对我总都是大有帮助的。

就这样,我们共同迎来了1949年北京的解放。在解放军围城期间,南京方面派一架专机,来接几位名单上有名的著名教授到尚未解放的南京去。锡予先生单上有名,但他却坚决不走,他期望看到新中国。有一段时间,锡予先生被任命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算是一个“过渡政权”。总之,北大师生共同度过了许多初解放后兴奋狂欢的令人难忘的日子。

1952年,我们北大从城里搬到了现在的燕园中来。政府早已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大校长,只有两个副校长,其中一个 is 党委书记江隆基兼任,实际上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就是锡予先生一人。马老德高望重,但实际上不大真管事情。江隆基是一个正直正派有理智有良心的老革命家。据我们局外人看,校领导是团结的。当时的北大,同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样,几乎是天天搞“运动”。然而北大这样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一只无形的带头羊,却并没有出什么娄子,这与校领导的团结和江隆基同志的睿智正直是分不开的。

还是讲一讲我自己的情况吧。出城以后,我“官”运亨通,财源大发。先是在城里时工资被评为每月1100斤小米,解放前夕那种物价一小时一涨,火箭似地上升的可怕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后来按级别评定工资,我依稀记得:马老(马寅初)是三级,等于政府的副总理。以下是汤老(汤用彤)、翦老(翦伯赞)、曹老(曹靖华)等,具体级别记不清了。再以下就是我同其他几位老牌和名牌的教授。到了1956年,又有一次全国评定教授工资的活动,根据我的回忆,这次活动用的时间较长,工

作十分细致，深入谨慎。人事处的一位领导同志，曾几次征求我的意见：中文系教授吴组缃是全国著名的小说家，《红楼梦》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我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他问我吴能否评为一级教授？我当然觉得很够格。然而最后权衡下来，仍然定为二级，可见此事之难。据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竟连一个也没有，真是一级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然而，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这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后来听说，常在一个餐厅里吃饭的几位教授，出于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的心理，背后赐给我了一个诨名，曰“一级”。只要我一走进食堂，有人就窃窃私语，会心而笑：“‘一级’来了！”我不怪这些同事，同他们比起来，无论是年龄或学术造诣，我都逊一筹，起个把诨名是应该的。这是由于我的运气好吗？也许是的；但是我知道，背后有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锡予先生。

俗话说：“福不双至”。可是1956年，我竟是“福真双至”。“一级”之外，我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是中国一个读书人至高无上的称号，从人数之少来说，比起封建时期的“金榜题名”来，还要难的多。除了名以外，还有颇为丰厚的津贴，真可谓“名利双收”。至于是否又有人给我再起什么诨号，我不得而知，就是有的话，我也会一笑置之。

总之，在我刚过不惑之年没有几年的时候，我还只能算是一个老青年，一个中国读书人所能期望的最高的荣誉和利益，就都已稳稳地拿到手中。我是一个颇有点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之